

【学界往事】

□吕家乡

赵纪彬先生

我至今也不理解,敢于向斯大林的理论叫板又久经沧海的赵纪彬先生,怎么也会犯这样的过失呢?不知他在晚年会有怎样的自我反省?



赵纪彬先生

我入校时,赵纪彬先生已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还给我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是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的一章。他是老革命,又是左翼文化界的名人,在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势问题的论争中,他就以“向林冰”的笔名成为一派的代表。

一位湛山寺的高僧也慕名前来听讲,这高僧不着袈裟,总是身穿深蓝色制服,戴着鸭舌帽,坐在最后靠墙角的座位,坚持了一个学期。赵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随兴所之。他也很少在黑板上写字,而且不喜欢总站在讲台上,常常站到讲台旁的墙角。有时一面思考,一面发出嘿嘿、嘿嘿的笑声,似乎被自己想到的某个东西逗笑了。嘿嘿、嘿嘿之后,也许接着是一串激动人心的连珠炮,也许接着又是沉默(可能沉默两三分钟),再次嘿嘿、嘿嘿之后,才发出一串连珠炮。他对于斯大林的理论有时流露出以为为然的态度,曾经说:“(斯大林说)‘方法是辩证的,

理论是唯物的’。嘿嘿,嘿嘿,怎么能这样说呢?辩证唯物主义怎么能这样分成两半呢?”“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变成了四大特征,否定之否定不提了。嘿嘿,嘿嘿,这能说是理论上的发展吗?否定之否定怎么能否定呢?”有一次,不知怎么,他说起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势问题的争论,说当时自以为理直气壮,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批评后,才有所反省。

赵先生不拘小节。有一次我到教师休息室去,正遇见赵先生和一位老师交谈。他双脚都脱下了袜子,一面谈话,一面抠着脚趾缝,有时还把手指放在鼻子前闻一闻,接着继续抠,神态安详自若,恬然自适。由此我知道赵先生大概患脚气。

不久我就看到了赵先生严肃甚至冷峻的一面。1950年春,孙思白先生申请入党,党支部讨论时,欢迎赵纪彬先生发了言,除了政治思想方面以外,还谈到孙思白先生的治学问题:忽东忽西,浅尝辄止,坐不住,沉不下心来,耍小聪明,不下苦功,这样只能有小得,而

不会成大器;还是要根据内外条件,做一个长期规划,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听了真有字字千钧的感觉。孙思白先生像个站在教师面前的小学生一样,额上汗津津的,做着笔记。这次孙思白先生的申请暂时没有通过,他和旁听者都受到了很大震撼和教育。孙思白先生后来成为民国史的第一权威,我想他一定会怀着感激常常回想起这些语重心长的意见。

平原省成立后,赵纪彬先生奉命调离山大,调任平原省副秘书长,不久升任秘书长,又转任省政协主席。凭我的幼稚的头脑,无法想象他会怎样履行高官职责,但我相信他不会做贪官,也不会做个摆架子的官老爷。打倒“四人帮”后,听说他在“文革”中一度成了唐晓文(“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之一)的顾问。我至今也不理解,敢于向斯大林的理论叫板又久经沧海的赵纪彬先生,怎么也会犯这样的过失呢?不知他在晚年会有怎样的自我反省?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蔡元培曾对胡适说,他的女儿在济南时,特地带了《老残游记》去游大明湖,将书中对名胜的描写跟大明湖景点相对照。

我读《老残游记》时,尚未到过济南。为了看看书中写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曾于上世纪70年代前往济南。

《老残游记》写人写景都很高明。胡适对此书的写景深加赞赏,认为《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小说都长于写人物,

【品读经典】

读《老残游记》

随感

□王春南

但写景均很薄弱、俗套。“《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前无古人”,多么高的评价!

我读《老残游记》两次,中间隔了几十年。第一次是从文学的角度欣赏,第二次是从历史的角度研读。书中写老残以布衣身份,手摇串铃,走街穿巷,一边为人治病,一边打探官场弊端和世风民情,了解到了很多身在官场的人所不知或知而不为外人道的情况。代理城武县令申东造就对老残说:“弟等耳目有所隔阂,先生布衣游历,必可得其实在情形。”“先生阅历最多,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经过调查,老残形成了一个观点:“清官”为名,酷吏为实的玉贤、刚弼之流,其实比贪官、赃官更可怕。书中写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老残所说的“清官”,其实是披着“清官”外衣的酷吏,老百姓痛恨他们,但他们的上司却对其十分信任,认为他们会办事,效率高。老残的上述看法,在清末很有针对性。

由老残的“布衣游历”调查官场和社会,联想到了古代朝廷委派大臣巡视地方,考察刺史、郡守、县令,是如何获得真实情况的。

汉、唐、明以及金朝都曾派遣大臣考察地方官吏(见赵翼《廿二史札记》)。《资治通鉴》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朝这样一件事: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22人巡察全国各地,按汉朝的“六条”进行查处。其中第二条为,官员不遵朝廷命令、制度,“倍(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六条为,官员勾结豪强,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刺史、县令等官员被贬黜的有一大批。这些受到处分的人,很不服气,络绎不绝地到京城向朝廷喊冤。唐太宗命巡视组成员褚遂良整理材料上报。唐太宗亲自定案,处理,以贤能提拔的20人,定死罪的7人,流放及黜免者数百人。

孙伏伽等人怎么能发现这么多人的问题?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我查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没有找到答案。我想,不管有多少种方法,有一种恐不能排除,即微服私访。这是古代钦差大臣们常用的方法。

《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实即作者刘鹗自己),不幸生于清代末年,其调查研究的能力得不到进一步施展;若生于唐太宗时代,他或许能担任孙伏伽巡察全国时的助理。这是我第二次读《老残游记》时的遐想。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辑)

【文化杂谈】

□俞祖华

中国家教第一人

曾国藩教子治家很有成就,但作为“最后一位大儒”,其理念、方法与话语传统色彩浓厚,自然不如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的梁启超更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位家长。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中外历史上成功实施家教的家长不乏其例,梁启超是其中的典范,有学者称他为“中国家教第一人”。或许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其在教育子女上尽心尽力的全面投入,其所育九个子女的满门俊秀,其400余封家书娓娓道出的亲子之情,其家教理念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足以说明梁启超无愧于这一称号。

梁启超的九个儿女个个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学有所成,成为对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栋梁之材。尤以“一门三院士”为代表,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子女也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三子梁思忠是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梁思达是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四女梁思宁是革命军人。

如果按世俗的眼光,比一比谁家的孩子发展得更好,梁家子弟自然不是最风光的,他们中没有大富大贵,均乃“百无一用是书生”。这里,首先有一个起点的问题,有的人出身于王公贵族、政治世家,有的人出身于豪门大户,这样的二代想不富贵都难,如果发展得很好,不能说与家教毫不相干,但它很可能不是关键因素。梁启超告诫子女“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总是给子女灌输那种凡事靠自己、爱拼才会赢的理念。梁家九个子女不靠“拼爹”,不依赖父亲

的名声,而是放开手脚走自己的路。在梁启超生前,也就是长子思成学成就业,父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没有选择父亲供职其间且又相对安逸的清华大学,而是凭自己的实力去了东北大学打拼创业,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其次,有一个择业与人生的价值取向的问题。梁启超要求子女不要追求名利地位、大富大贵,而是要努力争取有贡献于社会。他在家书中教导孩子们说:“你们各人要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又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便是一等人物。”

古代的士人为科举仕途而寒窗苦读,当下的学子为考公务员而趋之若鹜,但梁启超却告诫子女:“做官容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在他看来,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在历史上的作用非政治家所能比,他给思成回信时说:“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他要求子女不必追求飞黄腾达,也不必太看重物质财富,他说:“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可以支配。”

诚然,一个家庭的子女个个都有出息,也不是个案,少数,如“一门三院士”虽世所罕见,却非梁家所绝无仅有。被称为“黎氏三兄弟”的黎鳌、黎介寿、黎磊

石分别于1995、1996、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中国医学界传为美谈。与梁启超对梁家三兄弟成长为院士起到重要作用有所不同,在黎家,由于父亲早逝,由长兄黎鳌接济两位弟弟并将他们引上医学之路,最终成就了一个家庭走出三位院士这一医学界绝无仅有的传奇。有的父母可能也教子有方,但没有留下诸如家书、家训、家谱、家属后人追忆之类的文本,使我们无从准确解读其家教经验,并从中得到有益启迪。梁启超则不仅创造了满门才俊的家教传奇,也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家教理念与行之有效的家教方法。他的家教思想较集中地呈现在他写给子女的400余封书信中。梁启超家书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文本”。

在曾国藩、傅雷和梁启超三人中,曾国藩教子治家很有成就,但作为“最后一位大儒”,其理念、方法与话语传统色彩浓厚,自然不如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的梁启超更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位家长。傅雷教子以严苛著称,作家楼适夷撰有《读家书,想傅雷》回忆:“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相比之下,梁启超引导九个子女通过各自努力在不同领域做出不俗业绩的经验,更富时代气息,也更平实、更贴近寻常百姓。

(本文作者为鲁东大学教授,著有《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一书)



梁启超与家人